

# 城川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的红色摇篮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郝雪莲



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

70多年前,来自延安的革命火种照亮了城川的夜空。1945年,在快要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延安民族学院迁址绥远省鄂托克旗城川,这里从此成为培养民族干部的红色摇篮。

“城川民族学院是陕甘宁边区民族学院办学历程中最后一个阶段的习惯称谓。因民族学院师生习惯按办学地点区分民族学院的各个时期,早期在延安办学时叫延安民族学院,后期迁址城川后,就称城川民族学院。”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现任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政协副主席的于国强道出了“城川民族学院”名称的由来。

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等院校,创建于1941年9月,1945年3月迁址城川,1949年7月办学结束。它是中国共产党研究民族理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重要机构,在其近8年的办学过程中,培养了数百名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

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用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掀开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新的一页。为落实民族政策,创建少数民族自治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专门成

立了民族学院。延安民族学院自1941年创立,共经历了延安民族学院时期、延安大学民族学院时期、三边公学民族学院时期和城川民族学院时期。在艰苦卓绝的办学历程中,延安民族学院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革命英才,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实施和完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延安民族学院后期为何要从延安迁到内蒙古的城川办学呢?

于国强给出了这样的解答:“城川在近代史上是一个蒙古族聚居地区,它同时是陕甘宁边区伊克昭盟根据地的领导中心,中共中央西北局分管的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就设立在城川。伊克昭盟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民族工作试验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城川设立了蒙族自治区,所以将专门为建立新中国培养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

干部专门学校——延安民族学院迁到城川办学。”

于国强的讲述,把我们带回到7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

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为了适应伊克昭盟地区对民族干部的大量需求和加强对蒙古民族革命队伍的培训,1945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民族学院从定边迁至中共伊克昭盟工委和城川蒙族自治区所在地城川,接受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伊克昭盟工委的共同领导。城川时期的民族学院办学分为两个阶段,1945年3月在城川开始的固定办学阶段和1946年11月因内战爆发进入的流动办学阶段。

民族学院迁至城川后,由中共伊盟工委书记赵通儒兼任学院院长,王铎任副主任,薛向晨、宗群、彭达先

族和解放全中国的远大理想和战胜敌人的坚定决心。教学更注重联系绥远地区的实际,学员结合所学课程,深入到蒙古族群众中去,对这个地区的民族问题作调查研究。同时民族学院师生利用编排的文艺作品在蒙古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学员利用天主堂礼拜天的时间,给周边农牧民组织专场演出,宣扬党的民族政策,讲解抗日形势,增进了各民族团结,让蒙古民族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八路军,使城川周边的革命氛围十分浓厚,共产党的各项工作得到当地蒙古族群众的大力支持。

民族学院始终坚持将教育和生产结合。全校师生积极响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排除万难,为办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外,民族学院师生积极投身城川蒙族自治区的建设,广泛参与城川蒙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的民主政权建设当中。在民族工作第一线了解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了解政权建设的方方面面,为日后开展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城川蒙族自治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1947年8月,靖边形势恶化,民族学院东渡黄河到达山西绥远边区临县倪塔沟办学。11月,民族学院返回陕西绥德继续办学。1948

年春,为改善办学条件,民族学院迁至吴起镇金佛坪并编入三边干校,民族学院的管理机构和教职员工在伊克昭盟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在绥远干校开展办学工作。1949年7月,在伊盟工委的指示下,民族学院的负责人赵诚将民族学院所有学员从陕西带回伊克昭盟扎萨克旗安排工作,民族学院教师队伍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安排工作,延安民族学院办学历程结束。

回顾历史,在革命斗争中曲折发展的延安民族学院始终不忘初心。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从事民族教育的高等学府,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重要研究基地,是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教育的实验田,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民族院校的前身,在中国革命史、近现代教育史、中共党史、民族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

2002年,鄂托克前旗在民族学院旧址上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承载着新的历史使命,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团结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干部培训基地。

2017年,又在原址恢复建立了城川民族干部学院,构建起以“党性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目前成为西北地区一流的党性教育基地。

##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 “小学生手抄本”中的百年大党“学习基因”

字体端正隽秀,内容包罗万象,每个章节仔细标注……在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邓中夏小学时代的手抄课本常引得参观者驻足称赞。

邓中夏出生于1894年,1920年10月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参与创办上海大学、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就义时年仅39岁。

相比昂首走向刑场、视死如归的经历,大多数人对邓中夏的“学霸”往事并不熟悉。他以小学第一

名的成绩毕业,进入中学后每门功课都位列全校前三,得到“减免学费”的待遇,直至考入北京大学,结识了当时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即便是在那个信息传播不便的年代,少年邓中夏的手抄本竟然涵盖当时中国疆域、水道、形势、海防等各类知识,殊为难得。

“烈士,不仅有慨然赴死的感人时刻,还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品质,比如热爱读书。”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长赵永艳说。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提升理论修养,强调学思

用贯通、知行信统一。骨子里的“学习基因”,让百年大党与时俱进、愈显年轻。

少年邓中夏的手抄课本无疑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翻阅发黄的课本,一笔一画、用心至极。这位湖南的农村娃甚至早早放眼全球,记述了许多国家的地理和气候信息,比如写下“柏林地纬与黑龙江同度,三月尚冰雪。”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邓中夏读书不局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而是涉猎广泛、胸怀世界。

在课本中,邓中夏标

注各个章节,并分类归纳各部分内容,对其中出现的错别字也一一在空白处修改。如此严谨的习惯,无疑为他在革命时期创办《劳动者》周刊、创建工人夜校打下坚实基础。

学贵有恒。邓中夏在长期的艰苦奋斗环境当中坚持学习,甚至于他留给身陷狱中妻子最后的书信还在叮嘱要好好学英语——

“每天应常学习不可偷懒……我打算还替你选购一批书籍寄来,你要知

道:牢狱是极好的研究室呀!每天读书又可以消去寂寞烦恼!”

乐观主义精神和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跃然纸上。

在南京雨花英烈研究会理事胡卓然看来,邓中夏是“终身学习”的模范。刻苦的学习精神、对优异成绩的追求、严谨的学习态度,成就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优秀学者。

如今,为向革命先驱致敬,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设立“邓中夏中

队”。孩子们来到纪念馆时,都会被馆藏的手抄课本深深打动。

头脑清醒,方能政治坚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改革发展使命,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学习,就难以在战胜风险和战斗中持续前进。

“通过手抄课本能够看出,无论什么时代,持之以恒学习不可或缺,这正是革命历史文物留给我们的启示。”赵永艳说。

(据新华社报道)

##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